■观察家

外向型经贸政策需要适时调整

■人物志·张曙光

经济学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社会科学进步软件一等奖,两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

□张曙光

八月份,中国的出口总额907.7亿美元,同比增长32.8%,进口总额719.7亿美元,增长24.6%,贸易顺差188亿美元,连续4个月创历史新高。1-8月,外贸顺差累计948亿美元,按此推算,全年达到和超过1500亿美元,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与此相关,外汇储备也向一万亿美元前进。于是,围绕着汇率等经贸政策的调整又发生了一些争论。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观点是认为,汇率低估不是贸易顺差高企和内外经济失衡扩大的主要原因,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汇率调整并未对出口产生影响,升值也不能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经济失衡问题,有人甚至明确反对汇率的升值调整。

不错,中国的贸易顺差的确主要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在2005年101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占到了83%,今年的比例可能更高。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事实。不仅如此,双顺差也高度相关,共同促成了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一方面扩大了资本项目顺差,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外资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同时又扩大了贸易顺差。这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大特征。不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来观察和讨论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外关系,既无法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做出正确的解释,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失衡问题。就此而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种看法也有两点需要质疑:一是就事论事,没有将其放在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和长期发展中来考察,二是没有对造成这一结果的政策及若继续实施可能造成的问题做出应有的判断和分析。这两者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应当特别指出,一般来说,内外经济失衡加剧和贸易顺差扩大是对短期宏观经济失衡的反映,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却变成了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它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实施对外向经济的优惠和鼓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些政策包括汇率低估、税收优惠、贷款扶植、低地价、低劳工成本等。虽然这些政策对加快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政策的选择也是迫不得已,但当它的负面作用显现以后,就应当对此逐步加以调整。否则,问题会进一步积累,失衡会进一步加剧,损失会进一步扩大,局势也有可能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也提出了调整贸易政策和改善进出口结构的任务,并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例如,国家五部委联合下发了《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9月14日)。这种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调高和高低的安排也是合理的,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不过,从具体调整的类别来看,这一调整与其说针对的内外经济失衡,不如说是针对某些部门和产品的过快增长。

既然贸易顺差的扩大和内外经济失衡的加剧是一系列优惠政策的结果,那么就需要对这些经贸政策做出全面的调整。更何况,这些政策相互之间又是紧密相关的,单一的政策调整未必能完全达到目的。就以外商投资而言,今年以来,由于外资在一些领域的进入相当迅速,进入的方式也在从事一般投资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购并国内企业,有关方面制定并于9月8日开始实施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制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规定。这是正确的,因为坚持开放和必要的管制并不矛盾。与此有关,外商投资增长趋缓,1至8月,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71.92亿美元,同比下降2.11%,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227家,下降7.63%。这也很正常。因为,在国际收支账户中,外资购并不列入外商直接投资,而是计在证券投资项下,证券投资的增长取代了一部分直接投资。但是,有关方面却感到问题的严重,一方面继续推迟对外资"超国民待遇"政策的调整,原定8月审议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法案推迟就是一例;另一方面又简单地以人均引资水平为据,认为中国吸引的外资并不多,强调要更加积极地吸引外资。不错,中国人均吸引外商投资47美元,低于发达国家人均534美元和世界平均人均107美元水平。同时,中国的确需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的方针政策。但是,以人均引资水平为据是否恰当则值得质疑。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引资也许不需要、也不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恰当的判据也许是消化吸收能力,是资金供求情况,是经济内外均衡态势,就此而论,中国目前的引资水平的确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们的政策调整应当在提高引资质量和结构上用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主导地位和引进外资趋降为由,否认汇率调整是没有道理的。汇率升值不仅有双顺差进一步扩大和外汇储备持续积累的原因,也有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成本下降的依据。升值之所以对出口没有产生影响,不是由于升值没有作用,而是由于汇率升值不够,不足以改变某些出口产品的成本收益结构和人们的预期。因为,自从去年7月20日汇率重新定值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只有4%左右,而美元汇率也贬值了相当的水平。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政策未做调整,因而,双顺差进一步扩大,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内外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即使汇率升值幅度加大,其他方面的政策调整跟上,这种情况的改变也需要一个过程。汇率升值也只是其中的一项政策,且汇率升值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不升值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单独调整某一项经贸政策,更不是停止汇率升值的进程,而是如何通盘考虑,在用足现有浮动幅度规定和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幅度的同时,对经贸政策做出全面调整。

■来自日内瓦

拖欠房贷者是否会失去住房

□徐千惠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走向,引起房贷人高度关注。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房贷人的还贷意向,与这个市场有很高的关联性。这里,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情况。近四年来,美国房价的持续飙升,使得很多持房人自我感觉要比以前富裕多了,他们持有房产的感觉会增加他们的消费意愿。其实,许多持房人实际上都是通过住房贷款和其他信贷手段来管理自己财富的。

如今,随着房价上涨幅度减缓,房产的赚钱效应已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增长。正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旧金山分行行长Janet Yelle所言,房地产因素已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现在,有不少经济学家在关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当然,他们并不仅仅关心房价的变化,而是观察到了住房贷款人延迟缴纳住房贷款的现象在不断增加,并认为房贷人有可能会丧失住房赎取权。也就是说,当贷款人因困难无法偿还房贷时,住房贷款方如银行或其他房贷机构,就可以自由处置被抵押的房地产,并拿回它们的贷款资金,这也意味着房贷人将可能面临丧失住房的风险。

不过,住房贷款银行家联合会表示,发生住房赎取权丧失的事件只是个别现象,这类事件不太可能或至少不会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爆发。据该联合会的报告,今年头3个月中,每万人贷款人中仅有41人丧失了住房赎取权,但4月至6月以来,这个数字也仅为43人。另外,该联合会还编制了放贷清理占总贷款数的百分比。今年6月末这个数字为0.99%,而3月末为0.98%。这也表明,对房贷拖欠人的贷款清理数量在下降。

该委员会还发现,在今年第二季度中,每万人房贷借款人中约有439个人,他们的还款拖欠时间超过了30天以上,但房贷的总拖欠率仅为4.39%,这一数字比第一季度房贷总拖欠率4.41%还是有所下降。

近日,Yelle关于相信在中、长期内美国通胀率会下降的言论,导致了美国债券收益率连续下挫,长期住房按揭贷款利率也紧随其后出现下降。事实上,在11周内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已连续九次降低了。值得注意的是,住房贷款基准利率下降,将减轻住房贷款人的贷款负担,并将减少类似贷款人丧失住房赎取权事件的增加。

当然,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下降导致了美国住房贷款人的拖欠房贷比例上升,那么中国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事件呢?当然也会。不过,由于目前中国还缺乏实施能够行使债权人(如银行)权利的法律法规,一旦这类拖欠房贷的事件发生,受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商业银行了。这一点恰恰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多声道

国资管理者应成机构投资者

朱从玖(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大约70%的股权比例是由政府持有的。在解决股权分置改革和实现全流通后,中国股市市场结构中的国有股权占比过重问题就更加现实、更加突出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如果代表政府持有这些股权的国资管理者能够参照国际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用他们的方式和观念来管理这些资产,使自己在证券市场上扮演一个机构投资者的角色,中国证券市场将会发生质的变化。

设立私募基金已具法律依据

吴晓灵(人民银行副行长):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对于中国而言十分紧迫。根据我国的《证券法》、《公司法》和最近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私募基金的设立已经具备设立的依据。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需要注意三点:第一,可在法规中限定投资人资格,此外不应有特殊要求;第二,有注册机关抄报监管机构;第三,采取适当方式对其大额交易进行监管。所以,我国政府不需要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特别的限制,私募基金的税收应避免双重征税,将税收鼓励与企业设立分开,否则会加长审批时间。

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粮食问题已经基本破解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地球上水稻亩产的最高极限是1500公斤左右,攻克亩产900公斤目标后,我们还要向亩产1000公斤发起冲锋。目前,中国水稻研究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随着杂交水稻育种的突破,使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粮食问题基本破解,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在确保粮食高产的前提下提高质量。

世界油价将逐年下降四年后最高43美元

波德列夫斯基赫(俄罗斯"采里赫资本"公司分析师):明年油价未必会超过每桶65美元的价位,石油消费大国都在积极推行旨在降低油价的政策,特别是提高利率,结果是在最近一个月内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果类似的政策能持续下去,那么明年油价就可以轻易地降到每桶50美元以下。另外,今后5年世界油价将逐年下降5美元,到2010年最高油价不会超过每桶43美元。

(雨人摘编)

■本期人物话语

解决经济失衡:世界面临的共同责任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发展,就可能出现无序调整,最终将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各国的共同责任,需要相关各国结合本国实际,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全球经济失衡的有序调整。

■第三只眼睛

医保改革:效率与公平"一个都不能少"

□李长安

近日,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又出现了新的动向。有报道披露,我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将借鉴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英国模式"。如果该方案得到通过,也就意味着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全民医保"体制最终将付诸实施。

从世界范围来看,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不在少数,除英国外,还包括欧洲的大多数"福利国家"以及北美洲的加拿大等。从严格的意义来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和古巴等,也属于这些国家行列。事实上,我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搞过"全民医保"的尝试。改革开放后,由于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片面地强调走"市场化"的道路,也即在效率和公平问题上过于偏向了效率,使得我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被国家权威部门认定"基本上不成功"。统计数字也印证了这种普遍的看法:截至目前,我国不享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在城市中占44.8%,在农村中占79.1%。两项相加,在中国的13亿人中有约8亿人不享有任何医疗保险。其结果,我们的医疗卫生情况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1个会员国中排名倒数第四。

在医保体制公平性日益流失的今天,把强调公平放到比效率更为优先的地位似乎也有着更为坚实的现实理由。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为实行"全民医保"奠定了较为雄厚的资金基础。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933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3%,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而同期我国的GDP增长率为10.9%,还不到税收增长速度的一半。还有专家测算,目前新的农村合作医疗的标准是每人每年30元,全体国民算下来是390亿,如果设立每人每年100元的标准,全体国民是1300亿,约占年财政的5%,因此财政全部负担并非是"空口无凭"。

另一方面,英国经济在欧洲的"一枝独秀",也使人们对其"全民医保"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产生了诸多的幻想。英国实行的"全民医保"政策被世人津津乐道。英国医疗保障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平优先"。英国的医疗体制分三级管理体系:社区医疗服务保健体系,按城市行政区划设立的医院,政府在某些城市兴办一定规模的专科医院。医疗管理网络中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拨款(约为85%)。客观地讲,"英国模式"确实有许多优点,特别是它能合理利用卫生资源,而且它"覆盖面广"和"基本免费"的特性,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公平性。此外,"英国模式"还降低了卫生总费用,政府对机器设备、新型技术开发和传播的投资严格控制和管理,近年来英国卫生保健支出只占GDP的7%左右,远低于美国的14%。

不可否认,在我国财政收入持续增长,而民众对医疗保障制度需求日益旺盛的今天,实施英国式的"全民医保"也是保障公平的必要之举。但问题在于,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之下,医疗保障体制改革贸然搬用"英国模式",恐怕会产生以公平名义损害效率之忧。

首先,虽然我国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但相对于庞大的医保需求,如果实施"全民医保",也只能保证低水平的公平。诚如上面有些学者所测算的,我国财政固然能负担得起每人每年100元的医保支出,但在医疗费用猛涨、医疗体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区区百元钱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真正的"健康保护伞"作用,实在让人值得怀疑。其结果就是极可能陷入既不能保证公正,也容易损害效率的困境之中。

其次,"英国模式"虽然强调了公平,但也应该对其损害效率的负面性有清醒的认识。那种认为采用"英国模式"就能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观点,其实是对英国模式的一种误读。事实上,实施"全民医保"的英国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预算从大量的盈余(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变成了可观的赤字(2004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英国GDP的22%用于福利,这个比例虽然低于德国、法国和北欧国家(27%至29%),但却要高于美国(15%)。不仅如此,全民医保还导致了医疗效率的降低。在英国,患者如果需要大病治疗必须进行"排号"等待,而且由于政府用于医疗费用支出逐年上升,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着手改革现行的医保体系,并把提高医保体系的效率提到日程上来。

由此看来,我国的医保制度在由强调效率向强调公平的转变过程中,必须尽快寻找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在现阶段为了片面地追求所谓的公平而放弃效率,其结果就是不仅会导致医疗保障体系的低效运转,客观上也最终难以实现公平的目标。

■多棱镜

采取五大措施应对外汇储备迅猛增长

□徐平生

我国外汇储备即将超过一万亿美元,继续保持第一外汇储备国的地位。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分流这些外汇资金,我国外汇储备将继续迅猛增长,由此也必然会带来外汇储备结构问题、风险问题、管理问题和经营问题,对我国货币政策构成严峻地的挑战。为此,我们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分流外汇储备。

措施之一:抓住时机、果断调整外资政策。不可否认,过去的外资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不要忘记,我国的外资优惠政策也让外资获得了巨大利益。与此同时,各地为了吸引外资竞相压低土地价格甚至出现了"零地价"和"倒贴三通一平"等现象,带来了国家财源的流失。外商直接投资还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成本。现在,我国国民储蓄在保持高水平、资本不再稀缺、经济增长质量日益重要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我国的外资优惠政策,果断调整,实行国民待遇,提高外资流入质量,控制外资流入规模。

措施之二:要更加重视进口。未来的贸易战略必须对进口所带来的收益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中国可以进口的产品要比现在的进口结构更加广泛。另外,历来大国的地位都不是通过对外出口确立的,相反,谁的国内市场越大,谁的进口越多,谁在国际经济中的发言权就越大。现在,我们的邻国已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机遇而非挑战。

措施之三:为居民持有、运用外汇创造条件,藏汇于民。当前,尽管我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但我国对外净资产总额要大大低于日本,而日本民间持有高达三万亿美元以上的境外资产,是其官方外汇储备的四倍以上。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其外汇资产集中运用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外汇资产的运用效率,极大增加了外汇资产运用收益。因此,我们也必须大力提倡藏汇于民,为居民持有、多种形式运用外汇创造条件。

措施之四:促进官方外汇储备运用的多样化。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官方储备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仍将持续增加。为此,如何配置、运用储备资产,实现多重战略目标,提高储备资产收益水平,已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增加黄金储备。贵金属是重要的保值手段,特别是在美元面临长期贬值的背景下更为如此。现在仍是增加黄金储备的良好时机。这一方面是保值增值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和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需要。

(2)适当时机增加物资储备。今后一段时期,根据国际市场原油、重要金属等战略物资的价格情况,适时利用外汇储备进行战略物资储备。中国应该应用相对充足的外汇储备,建立与中国庞大制造业相称的战略物资储备。

(3)借鉴新加坡、挪威等经验,推动外汇储备积极管理。在满足储备资产必要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多余储备单独成立专门的投资机构,拓展储备投资渠道,延长储备资产投资期限,以提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水平。

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将改变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首先,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能够提高收益率,这是对财政收入的有益补充。其次,由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对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还可以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战略性作用。再次,新加坡和挪威通过对外汇储备实施积极管理,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不仅提高了收益率,而且国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也没有因为外汇储备的增长而受到削弱。

措施之五:对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当前,外汇占款已成为人民币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因此,部分外汇储备实质是我国的铸币税,我们完全可以根据铸币税/GDP的正常水平来合理确定外汇储备中铸币税规模,将这部分外汇储备划归财政部,利用这部分外汇资金进行政府战略性消费。如,进口高科技设备来支持科研与开发,进口先进的医疗设备,为研究人员提供出国交流或培训的经费,或者引进国外的专家和顾问等。